

中國植物志編纂史

丙申夏胡啟明署

1950—2004

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论著手编纂中国植物志，拟沿承植物分类学者同意。凡编纂多科植物者，应同研编纂中国植物志之该科，并共同选举总编辑人，总括编纂事务。

——一九三四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年会胡元祐提案

钱崇澍



第一任主编
(1959—1965)

陈焕镛



第一任主编
(1959—1971)

林镕



第二任主编
(1973—1978)

俞德浚



第三任主编
(1978—1986)

吴征镒



第四任主编
(1986—2004)



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ERS

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

胡宗刚 夏振岱 著

中國植物志編纂史

丙申夏胡啟明署

時年八十有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中国植物志》是一部拥有 80 卷 126 分册的煌煌巨著,由几代中国植物学家,历经八十余载编纂而成,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为中国科学赢得荣誉,也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本书意在对《中国植物志》编纂过程作一全面记载,探寻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始末,记述主要科、属编写经过和学术成就,藉以评述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历史。其主要内容按时间历程可分为:1922~1949 年学科的创建时期;1949~1958 年酝酿编写时期;1958~1977 年或编或停时期;1978~2005 年全面编辑时期。全书以档案记载和人物访谈为主要材料,力求忠实于历史,并以平实的笔法撰写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胡宗刚,夏振岱著.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313 - 15564 - 1

I . ①中… II . ①胡… ②夏… III . ①植物志—编辑—
历史—中国 IV . ①Q94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0832 号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

著 者: 胡宗刚 夏振岱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 - 64071208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6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5564 - 1/Q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 - 68180638

序

王文采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具有极为复杂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极为复杂的植物区系。因此，编写中国植物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中国历史悠久，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古代四大发明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欧洲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兴起，同时，自然科学各学科蓬勃发展，中国在这些方面却严重落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转机，在这期间，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三教授自美国，刘慎谔教授自法国先后学成回国。他们在大学教书，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分别在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创办植物学研究机构。到这时我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才得以开始起步，极为复杂的植物区系终于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始研究了。时至今日，由 312 位专家投入编写，费时 45 年完成的 80 卷巨著《中国植物志》问世之际，我们后辈们应该向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上述一代先贤们，以及他们培养的弟子们——中国著名分类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对这部巨著的完成所起的奠基性贡献。

《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中国三万余种维管植物的正确鉴定提供了一部重要工具书，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还为中国的植物区系的研究和植物学教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基础参考资料。此志书在科下分类和属下分类做得很好。我了解多数科的作者们都是按照专著或修订的要求进行编写工作，收集和研究尽可能多的文献和植物标本，在遇到疑难分类群时，多进行野外居群观察，或同时进行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等方面的工作。在每个科的编写工作将结束时，对有关科进行科下亚科、族的划分，对科中的各个属进行属下亚属、组、系的划分，这样，亲缘关系相近的种以及其他更高级的分类群都聚集在一起。在排列次序方面，演化水平低的分类群位于前面，演化水平高的分类群位于后面，这样给出的有关科的分类和属的分类系统，都符合植物分类学要求的研究结果。在植物学理论方面，因为多少反映出

有关科、属的演化情况,因而为有关科、属的系统发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在植物利用方面,对扩大有关植物资源的开发提供重要线索。从上所述可见,《中国植物志》无论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植物学研究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 2010 年 1 月 11 日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这部志书是中国植物志的第一版,比起欧洲具有先进水平的植物志,在如下三方面还存在差距。首先是种类齐全方面: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是调查采集,第二是描述,第三是实验,第四是分子学研究。中国的调查采集阶段,从二十世纪初钟观光教授开始算起,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至今在全国尚有不少空白地区未得到考察,这从《中国植物志》于 2004 年全部完成后,在中外的有关学报上仍不断有中国的被子植物新种及少数新属发表而可以说明。为搞清楚中国植物区系中的全部种类,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对空白地区开展调查、采集工作。再一方面是正确鉴定问题:在此志书的编写过程中,恐怕不少科的作者未能到国外有关标本馆查阅或从国外借到有关模式标本,缺少模式标本的研究,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鉴定。因此,需要进行有关科属的修订工作,这方面工作量不小。第三方面:中国维管植物三千余属中,不少属都存在疑难种或复合体(complex)等情况,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大,也需要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可见,现在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是第一版的工作,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后还须作出不懈努力。

在《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后不久,我高兴得知胡宗刚和夏振岱两位先生合作编写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一书稿,并获得机会率先阅读,了解到此书根据广泛收集的档案材料,全面介绍了《中国植物志》编著的历史背景和编写工作各方面的经历过程。我虽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参加《中国植物志》多个科属的编写,却对书稿中阐述的整个编写过程中的许多情况则是首次获悉。由于《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重要著作,本书稿的完成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本书出版后会受到植物学界以及其他方面的欢迎。

2010 年 3 月 12 日

(王文采: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八年筹备(1950~1957)	15
	一、合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17
	二、《河北植物志》	26
	三、第一次全国性植物分类学专门会议	34
	四、中国植物学会两次代表会议	39
	五、植物分类研究所一次所务会议	45
	六、思想改造运动与研究人员评级	48
	七、《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	54
	八、《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57
	九、姜纪五任中共植物所党总支书记	66
第三章	八年初编(1958~1965)	69
	一、改造之后的植物分类学家	71
	二、《中国植物志》编纂在“大跃进”中起步	79
	三、秦仁昌率先完成第二卷蕨类植物	84
	四、组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87
	五、《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92
	六、《中国经济植物志》	98
	七、一九六〇年	104
	八、出版受阻	110

	九、《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二次会议	112
	十、与国外学术交流	116
第四章	十年停续(1966~1976)	129
	一、“文革”中去世的植物学家	131
	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36
	三、重启《中国植物志》编纂	140
	四、《植物分类学报》复刊	145
	五、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148
	六、蒋英与夹竹桃科萝藦科编纂始末	150
	七、郑万钧与裸子植物编纂始末	154
	八、方文培与槭树科编纂始末	157
	九、秦仁昌第三卷蕨类志稿遭否定	163
	十、马毓泉龙胆科编写风波	171
	十一、重新组织禾本科编写	180
	十二、运动还在进行	184
	十三、杨柳科编写始末	189
	十四、严加审查的国际学术交流	192
第五章	回归学术(1977~1986)	195
	一、回归学术	197
	二、对唇形科之评论	200
	三、桦木科之署名	205
	四、重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前后	209
	五、编纂者两通函札	214
	六、科学出版社	218
	七、中科院植物所兴建植物标本馆	221
	八、十字花科编纂始末	225

第六章 最后十七年(1987~2004)	229
一、吴征镒出任主编	231
二、编委会办公室	235
三、申请经费	238
四、卫矛科编纂始末	242
五、与西方学术之交往	248
六、第一卷总论编纂始末	251
第七章 结语	257
附录	261
一、编年纪事(1950~2004年)	263
二、各卷册编辑、作者和绘图人员名录	278
三、《中国植物志》历年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306
人名索引	315
后记	322

第一章

引言



植物志(*flora*)是植物分类学的专著,力求完整记载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之植物种类。一般依分类系统编排,如恩格勒系统、哈钦松系统等。记载内容有:植物名称、文献引证、形态描述、产地、生态习性、地理分布、经济意义等;并有分科、分属和分种检索表,科、属、种的描述及形态插图等。编纂植物志是分类学的基本工作,其目的可以促进植物类群的细胞分类学、化学分类学、分支分类学、分子分类学等深入研究,也为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中有关植物的正确鉴定提供工具书,还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在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历史上,1753年瑞典林奈发表《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被看作是该学科开始的重要标志。由于该书主要涉及欧洲植物和起源于欧洲之外的栽培植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是早期欧洲植物志。该书声称概括了世界的植物,故又称之为世界第一部“世界植物志”,其实,也只是林奈当时所知道的一些世界植物。该书采用双名法,以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其中第一个名字是属的名称,第二个是种的名称。属名为名词;种名多为形容词,常用来形容物种的特性,或可加上发现者的名字,以纪念这位发现者,也有负责的意思。林奈书中以此方法命名了7300种植物,但所采用的系统还是人为的分类系统。待一百年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发表,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即任何生物都有它的起源、进化和发展的过程,物种是变化发展而来,各类生物之间皆有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进化论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分类学者重新评估已建立的系统,认识到要创立反映植物界客观进化的系统。系统应当体现出植物界各类群间的亲缘关系,这样的系统叫做系统发育系统。如此一来,直接推动19世纪植物分类学的发展。

继林奈《植物种志》之后,“欧洲分类学家一面继续进行植物界各大、小类群的分类学研究,一面又进行欧洲各国植物志的编写,一些分类学家还编写了

欧洲以外其他洲的植物志”，如瑞典 C. P. Thunberg 之 *Flora Japonica* (日本植物志, 1784); 英国 D. Don 之 *Prodromus floriae Nepalensis* (尼泊尔植物志初编, 1805); W. J. Hooker 之 *Flora Boreali-Americanana* (北美植物志, 1829~1840); B. Bentham 之 *Flora Hongkongensis* (香港植物志, 1861) 和 *Flora Australiensis* (澳大利亚植物志, 7 卷, 1863~1897); J. D. Hooker 之 *The flora of British India* (英属印度植物志, 7 卷, 1872~1897); D. Oliver 等人之 *Flora of Tropical Africa* (热带非洲植物志, 10 卷, 1868~1937); S. Kurz 之 *Forest Flora of British Burma* (英属缅甸森林植物志, 1877); J. G. Baker 之 *Flora of Mauritius and the Seychelles*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植物志, 2 卷, 1877); W. B. Hemsley 之 *Biologia Centrali-Americanana, Botany* (中美洲生物学之植物学, 5 卷, 1879~1888); F. B. Forbes 和 W. B. Hemsley 之 *Index floriae Sinensis* (中国植物名录, 3 卷, 1896~1905); W. B. Hemsley 和 H. H. W. Pearson 之 *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西藏高原植物志, 1902); 德国 K. F. P. von Martius 等人之 *Flora Brasiliensis* (巴西植物志, 15 卷, 1840~1906); A. H. R. Grisebach 之 *Flora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 Islands* (英属西印度群岛植物志, 1859~1864); L. Diels 之 *Die Flora von Central-China* (中国中部植物志, 1902); 俄国 A. Bunge 之 *Enumeratio plantarum quas in China boreali colligit Dr. Al. Bunge. anno 1831* (邦盖博士 1831 年在中国北部所采植物名录, 1833); C. J. Maximowicz 之 *Diagnoses breves plantarum novarum Japoniae et Mandshuriae* (日本和满洲新植物特征集要, 1866~1877), *Diagnoses plantarum novarum Asiaticarum* (亚洲新植物特征集要, 1877~1893), *Flora Tangutica* (唐古特植物志, 1899) 和 *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蒙古植物目录, 1889); 法国 C. Gay 之 *Historia fisica y politica de Chile, Botanica [Flora Chilena]* (智利植物志, 10 卷, 1845~1854); A. Franchet 之 *Plantae Davidianae* (大卫采集植物志。卷 1: 中国北部植物, 1883; 卷 2: 四川宝兴植物, 1889) 和 *Plantae Delavayanae* (德拉威采集植物志, 1889~1890); 瑞士 E. Boissier 之 *Flora Orientalis* (中东植物志, 5 卷, 1867~1884)。^① 此所列各类植物志书目尚不完全, 但从中不难看出不少植物志的编写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后的结果。虽然植物本身无国界, 科学也无国界, 一些

^① 王文采: 植物分类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生物学通报》第 43 卷第 6 期, 2008 年。

科学落后的国家或殖民地，其地植物之采集与研究，自然为科学先进国家所研究，对此本无可厚非。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争取独立时，在民粹主义鼓动之下，这些则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由他国之人代为编写本国植物志则会看作是该民族的耻辱。

中国疆域辽阔，群山连绵，湖泊浩淼，江河纵横，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孕育出丰富的植物资源，其中维管束植物即有3万种之多。如此丰富的植物种类，自16世纪开始，逐渐为现代科学先进之欧美国家所艳羡，不断派人来华采集，将所得标本带回国进行研究，用其国之文字发表新属、新种。编写出版一些关于中国某一区域之植物志书、名录。

中国乃文明古国，利用植物资源由来已久，农书、本草典籍向称发达；但先民对野生植物涉猎甚少，仅将视野停留在与人之生活相关的种类上。清朝后期，逐渐惊醒的朝野人士，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乃其中之一途。康有为在上海设强学会，此为中国学术机构之始。康有为又上书清政府，主张变法，复在北京设强学会，未几改为强学书局，刊行报章，不久被封禁，改为官书局。书局内设藏书院、游艺院及学堂。游艺院陈列化学、电学诸仪器及地质、矿物、动植物之标本，其学术研究机构规模初具。随后传统科举进学制度被废除，改设各级新式学堂，并派遣学子留学东西洋。在学堂之中，便开设有博物学课程，植物学为其内容之一。所采用教材来自邻国日本，所讲内容也多是日本植物，且甚为肤浅。至于研究，则未有从事者。

随着赴欧美留学之学生回国，展开科学救国运动，才将纯正的科学研究带到中国，同时也将从事科学研究之体制带回。其中生物学是由留美学者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人所开创，1921年他们先在东南大学农科设立生物系；在教学之余，于第二年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该研究所乃是秉志仿照美国费城韦斯特生物学与解剖学研究所而创设，倡导研究，采集标本，撰写论文，创办专刊，并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联系，交换标本、图书。该所由秉志任所长，所中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由秉志、胡先骕任主任。植物部有钱崇澍、陈焕镛等，动物部有陈桢等，其旨趣为探明中国长江流域之动植物资源种类，作分类学研究，为编纂《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植物志》作准备。

中国地域诚然辽阔，植物种类堪称繁杂，远非一个研究机构所能胜任。故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积极倡导，再为创办研究机构，并按各研究所所在区域而略加分工。此按各研究所创建先后，列举如下：1928年在北平设立静生

生物调查所,所长由秉志兼任,1932年胡先骕继任,该所致力于华北及云南植物研究。胡先骕北上之后,科学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由钱崇澍继任,继续长江流域植物研究。1929年在南京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钱天鹤任主任,先后在植物部供职的有秦仁昌、蒋英、裴鉴等,致力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植物研究。其后,该所于1934年改组为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又分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罗宗洛为所长。1929年在广州设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任所长,致力于广东、广西及海南岛植物研究。此外还有:1933年在重庆北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1934年在江西庐山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在广西梧州设立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1938年在云南昆明设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此皆为再传之薪。另有留法学者刘慎谔于1929年在北平创办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则属另一源流。该所致力于华北、西北植物研究,并于1936年在陕西武功设立西北农林植物调查所。如此众多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生物学一举成为民国时期甚为发达之学科,并取得良好之成绩,赢得国际声誉。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大学之理科或农科,不断有生物系之设立,在教学之余亦从事研究,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等;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东吴大学等。

诸多研究机构,在各自领军人物率领之下,无不在其研究领域而肆力,采集标本,发表新种,编写各地区植物名录、植物志等。当植物学事业规模粗具,新人辈出之时,1933年在重庆北碚又有中国植物学会成立。翌年该会在江西庐山举行第一次年会,胡先骕当选会长。在此次会议上,胡先骕有“编纂中国植物志”提案。云“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拟征求植物分类学者同意,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志之该科,并共同选举总编辑人,总持编纂事务,至于发刊曾与国立编译馆商定,由该馆负担。”会议议决:“由本会通知植物分类学者征求同意”^①。但是,其后该项提议并未立即组织实施。是时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已有百余人,在此次会议上,仅就各人研究类群作有大略分工。因此,此次会议可视作着手编辑《中国植物志》之始。

① 《中国植物学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给中国带来深重之灾难。植物学研究事业自然不能幸免于外,也遭到严重损伤,一些主要机构辗转迁徙,虽在后方得以为继,然植物标本、图书资料损失巨大。又由于事业经费锐减,其规模也缩小甚多。编纂《中国植物志》自难提到日程。待 1945 年抗战胜利,各研究机关纷纷复员,但研究条件却大不如前,经费异常拮据。1947 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愿出资与中国合作编纂《中国植物志》,胡先骕为编撰的主要负责人。此事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议由中央研究院植物所、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及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组成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并与美方详细制定了编撰办法。但其时之中国,政权之战正烈,社会已极不稳定,经济也处严重通货膨胀,此项合作计划无从实施。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赢得胜利,国民党则败走台湾。新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即成立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之编纂即列入中科院计划之中,由此步入正式实施阶段。自 1922 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建开始至此,可谓是学术积累阶段,凡 27 年,其中还有十余年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1949 年,新成立之中国科学院即将《中国植物志》列入科学规划之中,至 1958 年“大跃进”的声浪之中,正式开始编纂,可谓经过 8 年筹备。从 1959 年开始出版第一卷,至 2004 年最后一卷问世,历时 45 年,由 85 个机构参加,作者 312 人,绘图 164 人。全书共计 80 卷,计 126 分册,记载中国维管束植物(蕨类和种子植物)301 科 3 408 属,31 142 种,图版 9 080 幅。在 45 年的研究中,发表新属 243 个,新种 14 312 种,并提出一些类群的新的分类系统。

《中国植物志》出版问世,被称之为世界已出版植物志中,收集种类最多,篇幅最大的植物志,是一部科学巨著。诚然是中国植物学分类学家克服种种困难,作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但是与世界先进植物志相比,《中国植物志》尚有一段距离。在此介绍两种国外之植物志以便作一比较。

一为《苏联植物志》(*Flora USSR*)。1932 年,由科马罗夫(B. Л. Комаров)领导苏联植物学家开始编纂。全书 30 卷,记载植物 1.7 万种,1934~1964 年出版。该志系对此前近 200 年来前人所作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之总结。在此之前,更有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哈萨克、吉尔吉斯、拉脱维亚、土库曼、乌兹别克、乌克兰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些地区如列宁格勒州、摩尔曼斯克州、中西伯利亚等地区都编辑有植物志或植物图鉴,苏联的欧洲部分亚美尼亚、外贝加尔、立陶宛,苏联的北极地区、中亚细亚、塔吉克、爱沙尼亚也出版有植物志。

在《中国植物志》开始编纂之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已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被称之为老大哥，在各个领域都是学习的榜样。《苏联植物志》也被当作先进植物志，是追求的目标，并派遣留学生前去学习。但是，在编写《中国植物志》开始之时，如何展开，即将中国与苏联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力量作有对比。

苏联约有高等植物一万六千种，参加作植物志的植物分类学家前后约有 80 人，标本、图书齐全，已经作了 20 多年了，到现在还没做完，最后的菊科还没出来。再看我国，高等植物约有三万种，比苏联多了一倍光景；目前植物分类学家不过三四十人，比苏联少了一半左右；标本、图书条件比起苏联来又差得多，粗算起来我们作完中国植物志怎么说也得大约 60 年的时间。况且中国植物志既是植物学中的一部经典性巨著，同时又是赶上国际水平的标志，当然标准就不能低，它所包括的种类也应尽可能地齐全。除此以外，有很多老先生思想上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某某科的专家，研究了几十年了，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杀手锏”是不能轻易拿出来的。就这样，在标准、条件、个人威望等重重障碍之下，中国植物志就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①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植物志》还是在年轻的分类学家倡议之下，开始着手编写，且作出八到十年完成计划。如此不顾实际能力，纯粹为了适应“大跃进”需要。即便是其后以 45 年完成，许多时间段，为尽快完成计划，还是有不少科属是以降低学术标准，草率而成。

另一种为《欧洲植物志》(*Flora Europaea*)。欧洲各国之植物，经过二三百年研究后，大多数国家均先后出版有植物志。但其编著者，并非都是出自本国植物学家之手。编辑出版之后，多数植物志还经过多数分类学家的多次修订，质量不断提高。最终于 1954 年，在“巴黎国际植物学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编写《欧洲植物志》。T. G. Tutin 出任主编，由 25 个国家，187 人合作完成。该志以英语撰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一版出版于 1964～1980

^① 崔鸿宾、汤彦承：《十年内完成中国植物志》，《科学通报》，1958 年第 10 期。

年,全志共载欧洲维管束植物 203 科,1 541 属,约 11 500 种,是国际上公认的高水平著作。第二版于 1992 年开始出版第一卷。《欧洲植物志》之所以获得举世之赞誉,除了欧洲植物研究已有几百年之久,积累了丰富资料和标本,继承者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容编著。当然还有一个权威的编辑委员会,领导欧洲各国植物学家。对于该志第一版之编写,有这样介绍文字:

该志不仅是大批作者们同心合作的一项产物,也经过分别代表各欧洲地区的地区性顾问小组的审查,他们根据他们自己对地方的知识专长有机会审阅全部手稿,而且该志是受编辑方面的非常严格的控制的。这种受编辑委员会委托而进行的这种编辑控制,也就是说编辑委员每位成员对特定的一些科要负主要责任,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全部手稿都要经过广泛的审查、修改和校订,直到符合在几年时间内决定下来的标准为止。这种编辑过程包括这个进程的全部阶段,从核对第一稿的完整性、普遍的准确性、检索表的有效性、异名、分布和文体,甚至在按字头分装之前各层传阅,再到顾问审查,在送交出版之前,还要作最后一次审核。^①

就《中国植物志》和《苏联植物志》、《欧洲植物志》来看,由于《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有多种先天不足,致使其质量难臻完美。其一,对中国植物研究虽也有二三百年历史,但 1922 年之前,均由外人在从事。当国人开始进入此领域,除努力提升自己外,还积极投入到尚由西方人为主导的该学科当中。其后,所作之努力,获得之成绩,还是赢得世界植物学界普遍赞誉。但是 1949 年后,先前中国植物学家的努力,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否定,研究机构予以重组,研究计划重新制定,甚至研究成果亦不予以认可,与西方的学术联系也戛然而止。关于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文献资料大多藏在国外,难以获得。但仅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完全由中国学者在此时此境编纂《中国植物志》,条件实不具备。其二,在《中国植物志》编写之时,国内各省之植物志尚未全面启动,“中国地方植物志编写工作始于刘慎谔主持的《东北木本植物图志》(1955)和《东北草本植物志》(1958~2004),还有陈焕镛主持的《海南植物志》(1964~1977);而大规

^① (英)斯特里特(Street, H. E.)编、石铸译:《植物分类学简论》,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84 页。